

編輯室報告

傳播教育的再思考

張文強^{*}

「教學」是大學傳播科系的任務，對應這項任務，傳播教育應該教什麼、應該培養什麼樣的能力，是需要、也是每隔一段時間就被拿出討論的問題。近些年，新科技更是直接且急迫地促使傳播教育做出改變，在新開設課程與被取消課程的交替更迭中，傳播教育慢慢、無聲無息地轉向。當然，這種邊走邊改的方式有其現實必要，但就教育工作來說，走到某階段後也需要暫且停下來，用學術場域本身便擅長的思考分析，概念化、全面地討論與檢視傳播教育，以免在邊走邊改之間，迷了路。

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對傳播教育該如何進行提出屬於自己的論述，不過儘管論述各有不同，卻都經常一同陷入理論與實務的爭議。許多原因可以解釋這種爭議，而其中一項觀察涉及於學術場域同時肩負理論產製與教學工作的緣故，一方面，我們期待自己生產出來的理論有用，但，學術場域產製出來的理論卻經常是概念化、去情境化，甚至是應然面的；另一方面，教學企圖讓學生具有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但，實務問題卻經常是個案式、情境式，充滿寫實因素的，因此，期待利用理論解決實務問題自然並不容易。特別是做為應用學科的傳播學，在「應用」間，學者們更需要面對理論有沒有用的矛盾。或者說，這也正是應用學科的宿命，我們總是期待傳播是門有理論的「學」，具有學術合法性，卻又希望能教會學生如何「做」，成為技術純熟的實務工作者。

矛盾、宿命中，許多研究還是想要回應傳播教育的問題。舉例來說，鍾蔚文、臧國仁與陳百齡（1996）假設傳播學知識系統過於淺薄，且技術

^{*}張文強為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聯絡方式：049214@mail.fju.edu.tw

層面過重，然後透過程序性知識、陳述性知識的心理學區分，詳細地討論了新聞系應該教什麼，並建議開設三類型的課程。一是培養觀察現象、分析資訊、呈現資訊能力的課程，二是反映環境特質的課程，三是「做」的課程。

不可否認，有關傳播教育應該教什麼的研究論述具有一定學術指引效果，但傳播做為應用學科的宿命指向三項需要關切的問題。

壹、傳播科系教育目標是什麼？

在討論傳播科系要教什麼的同時，經常對應著：傳播教育需要有用，需要訓練出好的「傳播人才」。基本上，這個命題並沒有問題，只不過在我們理所當然假定新聞系對應新聞業、廣告系對應廣告業、廣電系對應廣電業的同時，也透漏出一種傳播教育的「產業模式」(Mensing, 2010)。

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滲入學術場域，以及強調教育需要與未來工作接軌的大學體制內，產業模式是極為穩定、理所當然的存在。例如，我們習慣於新聞教育要培養懂得採訪、查證、寫作的新聞工作者，或者跟隨媒體發展趨勢，期待教育出報社、電視台、數位網路需要的人才。或者用更重的話語來說，我們假定傳播教育要為傳播產業服務，所謂有用的知識，或者知識要有用的關鍵在於它是不是產業認定需要，或學術場域認為業界需要的知識能力。當電視台長官期待記者要會過音，那麼學校有沒有教過音、學生會不會過音，便成為評斷新聞教育有沒有用的標準。業界如此，然後學生、老師亦是如此。

姑且不論產業模式讓傳播教育成為職業訓練所的風險，如果我們跳脫產業模式，跳脫大學教育需要與產業接軌的說法，理論上，傳播教育可以有著不同的目標、不同的模式，而目標不同、模式不同會影響到要教什麼。Mensing (2010) 便提出「社群模式」，強調新聞工作與社群的自然連結，應該重新回到為社群服務的初衷，而不只是為特定產業服務。拉高層次來看，如果大學教育的目標在於培養公民、知識分子，而非只是好勞工，存在一種「公民模式」，那麼，提供所謂的博雅教育，以及養成對於社會的觀察、分析與批判能力便是重要工作。再以新聞教育為例，當我們假設記者

需要的不只是成為老闆心中好勞工的各項知識技能，更應該具有知識分子的關懷，那麼，面對多元、被遮蔽的社會情境，如何強化多元文化、增進社區溝通及公民行動能力，便成為新聞教育必要的工作。

也就是說，教育目標的設定將影響傳播教育的內涵。產業模式有其意義，但我們不能受限其中而不自知，不自覺地由產業需求定義教育的目標。特別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當下，不自覺將傳播教育設定成培養產業所需人才，無論初衷為何，都將冒著將教育化約成職業訓練所的風險，也限制了傳播教育的想像。例如在產業模式強調的技術能力之外，藉由批判訓練關照新聞產製過程（Skinner, Gasher & Compton, 2001），或者給予應然面的倫理思維，便可能讓新聞教育展露出不同的想像。同樣地，廣告教育要訓練的是嫻熟廣告技術的勞工，或者兼具公共關懷的行動者，也影響廣告系要教些什麼內容。

貳、如何教的問題

其次，不只是「教什麼」的問題，傳播教育還涉及「如何教」的問題。

一直以來，我們習慣一種理論與實作二分的教學方式，理論課程經常不自覺地與背誦連結起來，以為記得愈多理論內容愈好，愈有學問；相對地，實作課程則以操作練習方式進行，想辦法讓學習者懂得編輯的版型、如何操作空拍機等。基本上，對應理論與實作知識的本質差異，這種二分教學方式不無道理，但在二分法的簡單明瞭之間卻也失去了精緻學習的可能性。例如光是背誦創意相關理論，往往不會增加創意能力，反過來，光是重複練習，採訪技巧的增進速度也可能極為緩慢。

無論如何，近年來不同的教學法，例如翻轉教室、問題導向學習法（PBL，Problem-Based Learning），雖然像是學術場域的流行風潮，但是做為改善教學提案方式的它們，也的確提醒了「如何教」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相同的教學內容可以有不同的教學方法，不同教學法會有不同教學效果。

單從學術場域擅長的理論教學來看，理論知識在日常生活中沒有用，經常不是理論本身的問題，而是出於知識傳授與實踐問題。理論知識不應該只是教室內的抽象知識傳授工作，它們應該被放在真實情境中，透過對

話、模仿、練習等實際行動，理解理論知識的真正意涵，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Lave, 1993; Lave & Wenger, 1991）。

就此加以延伸，理論像是將類似社會現象加以蒸餾後的成果，因為是蒸餾，所以往往失去許多情境變項，在運用時，需要加以將情境還原。也因此，理論的教導應該引導學習者理解每個理論背後的基本預設、建構理論時所對應的社會情境，以及如何因應不同情境調整解題策略。例如我們除了教授馬克思理論內容，還應該讓學習者理解馬克思發展馬克思主義時，歐洲處在哪種工業化與資本主義階段；如何預設一種以生產為中心、貧窮勞工的社會脈絡；當時序來到當下消費社會，消費社會的各種結構變項可能如何改變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又該如何進行調整以理解消費社會中的資本主義問題。

當然，就「如何教」來說，這些都還屬於可以文字化的事物，但是「如何教」的真正關鍵也許落在該如何讓學習者真正體驗到「剝削」、「意識形態」、「剩餘價值」這些概念。例如透過舉例的方式？團體討論的方式？田野調查的方式？設計學習者被剝削的情境？要求實際進入工廠工作？同樣地，該如何教導「創意」、「符號義」、「公共性」也都有著同樣問題。理論是抽象的，要如何教導學習者理解抽象概念，需要老師發揮創意。

最後，在加入學習者特性、學習態度等因素後，如何教的問題將變得更為複雜。特別是在液態社會脈絡（Bauman, 2000, 2003）下，當學習者強調所有的學習都要有用，而且是立竿見影、業界認定的有用；當學習者缺乏學習黏性，已經不太願意反覆練習一項技能時，想要讓學生願意靜下心、層層深入思考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進行帶有負能量的批判思考，是理論教學方式的極大挑戰。這種挑戰涉及的或許已不是「如何教」的問題，而是「學習意願」問題。

參、「有用」知識能力以外的東西

第三項有關傳播教育的思考是，教育是不是只在於教導知識能力？或者，「有用」的知識能力以外，傳播教育還應該教什麼？

在「產業模式」中，因為教育要與產業連結、學校教的東西要有用，

所以教育不自覺地被引導到個人知識能力訓練之上，唯一差別往往只在要訓練技術能力或是理論能力，例如直接教導拍攝剪接技巧，或加入美學概念的攝影剪接知識。又例如前述鍾蔚文等人（1996）的確提出不一樣的知識架構、更為細緻的教學內容，但這也反映他們終究是從知識能力角度來處理問題。理論與實務場域都重視知識能力的訓練，只是對於有用知識的定義不太相同。

當下學術場域習慣將教育當成傳授知識能力的訓練。這種直覺觀念並沒有錯，教育需要教導知識能力，但一個關鍵是知識能力，特別是「有用」的知識能力是不是教育的全部？學術場域是否跟隨這種直覺將教育過度化約成知識能力的訓練，認為好的傳播工作者就是具有知識能力的行動者，忽略了「有用」知識以外的其他構面？

扣合主流的實證主義知識觀，這裡主張，資本主義主導、工具化的教育脈絡存在一組關於「有用」知識的問題。首先，學術場域似乎存在一種展現信奉預測、控制式知識的弔詭，就是不自覺地期待知識要有用，可以有效解決問題，忽略知識還有其他形式或目的，例如解構與批判社會現象的能力。在相信知識要有用，而且是立馬解決寫作、拍攝等問題的假設下，解構與批判的能力顯得無用，不受學習者青睞，但就 Habermas（1971 / 郭官義、李黎譯，2001）而言，這種「無用」知識可能更為重要，它可以幫忙學習者觀察、分析社會現象，擁有這種「無用」知識，才可能做出好的資料新聞學，帶有人文關懷的影像作品。

其次，批判能力或許還算是廣義的知識，如果更為跳脫從知識能力角度看問題的習慣，我們不難察覺傳播教育包含其他的成分，例如「倫理」。在過去，這是教育重要的環節，不過在當下，倫理不屬於知識能力的範疇。「有用」這項標準將倫理無用化，甚或因為倫理對實務工作會產生負面影響，而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然後讓它退居傳播教育邊緣，就只是一門形式課程而已。再或者，後現代與相對主義的流行更是放棄了倫理概念，倫理是大論述，因此被束之高閣、被放逐。這裡並不在幫忙倫理申冤，不過也的確想表達除非倫理確實有害，或真心認為倫理沒有存在價值，否則倘若只是因為它不具「有用」性而拋棄，這種作法似乎不具有合法性。如果我

們期待傳播工作者不是匠，而有成為公民、知識份子的可能，那麼，倫理可能是同樣重要，至少是需要關切的東西。當然，這種關切不是只開設一堂課程而已，也涉及前述該如何教的問題。

最後，需要凸顯成為好傳播工作者意志或態度的重要性。例如，新聞教育經常假設教會採訪技巧、如何與消息來源周旋等知識能力，學習者就有可能成為好記者。再一次地，這種假設並沒有錯，好記者的確需要這些能力，不過另一種觀察角度是，擁有這些知識能力是否就足以成為好記者？特別在液態脈絡（Bauman, 2000, 2003）中，當新聞工作者不再帶有黏性地投入工作、不把新聞當志業，而是一種可以隨時來去的工作（張文強, 2015），那麼，缺乏做為好記者的意志，與缺乏做好新聞的「態度」，極有可能讓所有知識能力教育都顯得枉然。或者如同存在主義新聞學的說法（Merrill, 1996／周金福譯, 2003），新聞應該是要有熱情的工作，而不只是客觀報導新聞而已。同樣地，缺乏廣告意志的廣告工作者可以是技術純熟的廣告工作者，但似乎總少了些什麼東西。

當然，這裡必須承認意志與態度很難教，而且在當下，強調意志、態度並不政治正確，可能會被視為傳統與保守主義的復辟，但，在資本主義主導的環境中，連同教育目標、如何教這些問題，倫理、意志、態度也許值得我們深思。當我們不自覺陷入「有用」知識能力的定義問題，不自覺將傳播教育構連到能否訓練出業界期待的有用傳播工作者，我們也許也不自覺地落入類似單向度人（Marcuse, 1964／劉繼譯, 2015）的思維模式中。傳播教育被「有用」帶著走，失去反思批判的可能性。

在傳播教育重要，且需要不同思維的脈絡下，本期以傳播教育做為主題概念，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林鴻亦副教授撰寫〈《傳播與社會創新》的課程實踐與摸索：以漢娜·鄂蘭思想為基礎探討共同體的公共性原理〉。他仔細探索自己在《傳播與社會創新》課程的教學經驗，於公共性這個核心傳播問題上，經由與哈伯瑪斯和漢娜·鄂蘭的理論對話，林鴻亦強調了鄂蘭的兩個概念：多元性以及生活世界中的偶然性，並且藉由多元性反抗近代因認同所造成的全體主義，另外，透過生活世界中的偶然性回應共同體的公共性原理。然後以此為基礎，作者將學習者帶離教室，透過實際進入地

方社區實作的方式，體會鄂蘭的公共性概念。本課程以「為了社區營造的傳播創新」為目標，可被視為一次挑戰新聞教育「產業模式」的勇敢實驗，讓我們看到不同教學目標、教學方式的可能性。

本期另有三篇一般論文。銘傳大學新聞系教授賴玉釵〈閱聽人詮釋《哈利波特》故事網絡之跨媒介地景歷程初探：以虛構文本、文學地景及周邊為例〉，論述了跨媒介敘事這種互文性文化現象。賴教授探討閱聽人會在互文性基礎上彌合實景及周邊「跨媒介間隙」，建構出多平台的跨媒介地景。其間，閱聽人可能引用衛星文本擴充核心文本，並且穿梭在文學文本、電影與實景之間，利用實景與相關商品補足小說未敘明的細節。

輔仁大學大傳所碩士莊稀媛與新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賴盈如〈美容整形對女性自我身體意識、自尊、與臉書上的自我揭露之影響初探〉透過量化方式探索美容整形這項議題。研究結果發現，美容整形手術的術後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女性術後自我身體意識，以及在臉書上揭露醫美相關訊息和自我揭露的數量；術後自尊則會正向影響女性術後身體意識，以及臉書上自我揭露的數量、內容正向性、深度與準確度；術後身體意識則負向影響女性在臉書上揭露醫美相關訊息程度和自我揭露的深度。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柯秀卿〈選戰策略：2016 台灣總統選舉臉書的政治溝通〉，以 2016 年台灣總統大選蔡英文官方臉書為研究對象，探討選戰過程中臉書的政治溝通策略。作者以亞里斯多德的語藝為分析基礎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感性訴求是蔡英文臉書於總統競選期間高度使用的語藝策略。此外，無論是就按讚、分享或評論，感性兼人格可信度是吸引選民進行線上公民涉入頻率最高的語藝訴求。

最後，同樣感謝本期各篇作者、編輯委員，以及審查人的辛勞付出。《傳播文化》需要學術圈同仁的繼續支持，歡迎各位來稿，歡迎具有創新觀點的傳播學術文章。當然，我們也會持續努力編輯最好刊物，促成傳播場域之內，以及與其他場域間的對話。

參考文獻

- 周金福譯 (2003)。《新聞倫理：存在主義的觀點》。台北：巨流。(原書 Merrill, J. C. [1996] . *Existential journalism*. Ames, Iowa :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郭官義、李黎譯 (2001)。《認識與旨趣》。台北：風雲論壇。(原書 Habermas, J. [1971] .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 Beacon Press.)
- 張文強 (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台北：五南。
- 劉繼譯 (2015)。《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台北：麥田。(原書 Marcuse, H. [1964] .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 (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07-129。
-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Bauman, Z. (2003).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 Lave, J. (1993).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In S. Chaiklin & J. Lave (Eds.),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pp.3-32).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ve, J. &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nsing, D. (2010). Rethinking [aga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1(4), 511-523.
- Skinner, D., Gasher, M. J. & Compton, J. (2001). Putting theory to practice: A critic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2(3), 341-360.

